

不被算账的生育：学术互生性如何从优化逻辑的剪刀下自救

优化系统切除火种，并不构成对火种的完全消灭

张琼 著 · SDE 学员 · 伦理频道 之4 · 2026年7月27日

摘要 西方人类学的“伦理转向”入境中国学术生产系统后，经历了一次通常被描述为“范式变形”的沉降。已有四种主要解释分别从学术场域的象征资本分配、治理术的身体规训、范式跨海传播中的常规化冷却、以及学术劳动在考核体制下的异化，精细分析了变形的不同侧面。本文穿过这些分析，指出它们在追到各自极限处时，不约而同地停在了同一个未经审查的先验预设前：存在一个能够识别并最终守护“有价值的创新”的评判者或机制。本文将此预设命名为“守护者假说”，并予以撤销。撤销之后，以往被“制度不善”叙事所包裹的冲突露出其更根本的面相：优化逻辑对创新火种的系统性切除，并非一套可以被纠正的错误程序，而是计件式的学术生命秩序在自我维持时必然执行的呼吸节律。被排出的火种无法依靠任何外部守护者获得正名。但本文论证，火种的熄灭并非切除的唯一结局。在优化系统无法完全穿透的身体深处，某些被切除的研究动作——那些曾让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身体层面发生不可逆相遇的动作——能够以一种不依赖外在承认的方式自我积蓄。本文把这种积蓄方式命名为不可计件的学术互生性：它指向一种关系性事件，在其中，研究者的学术身体与被研究者的伦理经验在同一个动作里相互生成，其存续不需要以论文、引用或任何形式的同行承认为前提。优化逻辑可以切掉一切可预判的“成果”，却无法预判一个研究者凌晨三点在非计划、非访谈的沉默中，被一个老人擦手的动作触发的、对其自身学术身体的不可逆重塑。本文通过一个深度生成机制案例的追踪，展示了互生性的发生机制与可能传递方式，给出了该概念与波兰尼“内居”式的隐性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人类学的反思性、无形学院的隐性交往、身体记忆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照护劳动研究中“不可计量的关怀劳动”等一系列最接近概念的逐层区分，并诚实交代了概念的可裁决边界与证伪条件。

关键词：伦理转向；学术优化；守护者假说；学术互生性；不可计件；生成机制；隐性知识；照护劳动

一、引论：被反复错过的追问

西方人类学的“伦理转向”进入中国学术界的二十年，是一段已被反复讲述的历史。较温和的讲述视其为一场成功的范式旅行：新的理论资源进入，新的经验领域打开，一批以“日常伦理实践”为议题的民族志论文填补了此前偏重权力批判与苦难叙事的空白。从文献积累、课题数量、共同体规模等表层指标看，这个判断没错。

另一种更锐利的讲述把同一段历史诊断为“被优化的善意”。它不再只看新增的文献，而是看新增文献背后的生产逻辑：沿着三根看似中性的学术优化轴线——安全引证、高效产出、稳赚核算——伦理转向中最可能扰动既有秩序的那些锋利面，在落地过程中被系统性地切掉了。留下来的不是被压制的天才，而是一条规范、自治、可预期的产品线^[1]。这第二种讲述比第一种深了一层，因为它把变形的责任从某个人的选择或某个机构的恶意那里移开，转而描摹优化逻辑本身如何构成了一台隐形的筛选机器。

然而，两种讲述在追至某个深度之后，不约而同地停在了同一道断崖前。它们说：优化系统切掉了创新火种。它们说：安全配方让造反变为综述，高效生产让田野身体失去长时段浸泡的时间感，稳赚核算让不算账的学术动作被提前排除。这些判断精确，却始终没有继续追问一个更让人不安的问题：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那些“被切掉的火种”，在被切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问题并非对既有诊断的否定。它是对既有诊断的继续。旧诊断道出了刀的落点。但一把刀切下之后，留下的不是只有“已切除”与“已存活”两栏清算表。在优化系统的正常运转中，绝大多数被切掉的动作确实就此消失了——花三年追一个擦手动作的研究者没有发出论文，考核未通过，他转了行。他那位凌晨三点用温水给故去婆婆擦洗身体、持续整整四十分钟的田野对象，连同她沉默的动作，在他转行之后，再也没有被任何人写进任何一篇论文。这是清算。

但没有另一种可能？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那个追了三年而未能写出论文的人，在转行之前，在他自己身体的某个深处，把他追了三年而没能说清的那个东西，转化为一笔不记在任何考核表上、却切切实实改变了他此后学术身体质地的生命存量？这笔存量不叫“成果”。成果需要被发表，他这篇没发。但这笔存量仍然发生了，而且它的发生，并未依赖优化轴的宽容——优化轴从未宽容过他。他是在优化轴的剪刀正在切下的时候，在剪刀够不到的那道窄缝里，自己撑开了另一种生。

这不是鸡汤式的假设。这是本文要提出并予以严格论证的核心判断：优化系统切除火种，并不构成对火种的完全消灭。某些火种在被切的同时，在优化系统无法穿透的身体深处，能够自己长成另一件事——一种不依赖外在承认、不依赖任何守护者识别、不被计件逻辑穿透的自我积蓄方式。本文把这种方式命名为不可计件的学术互生性。

这个命名不替代旧诊断。旧诊断说了刀从哪儿落。本文要说的是，刀在落下的一瞬，那个被刀锋划过的身体，有没有可能在刀锋够不到的深度里，自己长出了一层新骨。若这层新骨被证明可以发生，优化批判的重心就需要整体位移：不再仅追问“制度切掉了什么”，而同时追问“被切掉的东西，如何在制度无法彻底封死的窄缝里，自己生了出来”。

为了把这层新骨指认清楚，本文必须先做一次诚实的清算：把既有的四种最有深度的旧解释，逐一追到它们各自够不到的边界。旧解释的边界一旦被完整画出，那条逼出新概念的分界线就会不可避免地浮出纸面。

二、穷尽旧解释的诚实清算

过去二十年，但凡对学术生产体制做过深度诊断的学者，都从各自的进路触摸过本文处理的同一片地层。四种主要解释框架——分别来自场域理论、治理术批判、范式演化与学术劳动异化——在各自的射程之内都精确说出了某些要害。本文无意证明它们错了。本文要做的是诚实指出它们各自追到了哪一步停住——以及这个停住之点，恰好就是“守护者假说”悄然入场的门槛。

第一说：场域筛选。布尔迪厄的学术场域理论揭示了一架精密的象征资本分配机器。一个年轻学者逐渐学会辨别什么议题“可说”、什么方法“可接受”，这个过程并非行政命令的产物，而是惯习被场域结构反复塑形之后的身体直觉。当评审认为一份申报书“方法不明确”时，他通常不是在故意压制创新，而是在诚实地行使他被场域训练出的判断力。

场域理论追不到的地方在于：它预设了场域的承认机制虽有个案误差，但长期来看，“能被承认的”与“有价值的”在大方向上仍然同构。它没有为一个更极端的情形留足空间——在某类特定的制度组合之下，承认机制的筛选方向会发生系统性逆转：被筛掉的并非差东西，而恰恰是那些最优异却最不像“可被承认”样式的东西。场域理论之所以看不到这一逆转，是因为它暗中预设了一只手：总有一个位置——资深学者的共识、学术共同体长期的集体理性——最终能够识别出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这个位置，就是第一尊守护者的剪影。

第二说：治理术内化。福柯的治理术批判比场域理论更精细。它揭示权力已不再主要依赖禁止与惩罚，而是靠考核、指标、规范化技术，让被治理者“自愿”将治理目标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准则。一个学者“自愿”选择安全选题、“自愿”放弃长时间田野浸泡——这些选择并非被命令做出的，而是在经年的考核节奏中被治理术反复训练成的身体直觉。在田野现场，研究者的手没有拿起笔去记那个老人拍膝盖的动作——那个当下的放弃，不是理性核算的结论，而是权力技术在身体层面的完成。

治理术批判停下的地方在于：它揭示了一套权力技术如何让研究者做不出某些研究动作，但出于福柯自身的理论审慎，它悬置了规范判断——它不负责论断“做不出来的那些是否比做得出来的更好”。然而，一旦你顺着这条线索再往前一步，追问“如果那些被权力技术切掉的动作里确实有一批对学科理论突破的贡献潜力更大”，你就会发现，治理术批判必须暗中借助另一个预设才能把这一价值判断塞进去：存在一个处于权力技术外部、或处于一个尚未被彻底穿透的抵抗位置上的眼光，能够指认“这是好东西”。这个眼光，是第二尊守护者。

第三说：常规科学沉降。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伦理转向在中国的沉降提供了最现成的叙事模板：一场范式革命在跨海传播中，从初期的造反锋利沉降为后期的常规解谜，研究者不再挑战范式本身，而是在既有框架内做应用与细化。伦理转向从“造反”变为“规范应用”，看似的确符合库恩模型的标准路径。

但库恩的叙述在关键处缺了一环。他的常规科学概念预设了：沉降之后被留下来的那个“常规”，是范式革命本身在不同阶段的合理延续。在跨海传播的情境中，这个预设并不成立——因为降格的核心机制不是“范式冷却”，而是进口条件本身对范式内核进行了一次结构性切除。被留下来运转的并非常规科学，而是被切掉了造反刃口之后的一套流程替代品。它在表面上做的是解谜，但它解的并非旧范式的谜，而是一种与旧范式已失去深层机制联系的格式训练之谜。库恩之所以未能看见这个差别，并非因为他的模型粗糙，而是因为他的整个叙事建立在一种范式是业已成功的回溯性叙述上^[2]——他讲述的，永远是已经发生过的、已被承认的、已被写进教科书的革命。而本文面对的那批火种，是在革命尚未发生、甚至永远不会被承认的阶段就被切掉的。库恩的框架里没有这个阶段的位置。他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他的叙述里始终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着——某种机制（后来的历史书写、学科史的追认）会最终识别出那些“曾经被埋没的”是真正的革命。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第三尊守护者。

第四说：学术劳动异化。布若威以降的学术资本主义批判，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来描摹当代学术劳动：绩效考核、发表压力、短期合同将研究者的学术劳动从自主的、完整的创造，转化为标准化的、可计件的生产。年轻学者对自己写的论文“没有感觉”——因为那论文不是他自己追了三年的问题，而是他为通过考核按安全配方生产出来的产品。异化批判说出了这份痛苦的质地。

但它说不出的，是另一件事：那个被标准化论文替代掉的、他自己追了三年而没追成的东西，究竟算不算“被异化切掉的原创劳动”？如果它尚未成形，还为散乱的田野笔记和模糊的身体记忆，它就尚未构成“劳动产品”。没有产品，也就没有那个从产品中被“异化”出去的完整主体。异化理论处理的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分离”，它处理不了“劳动尚在孕育、劳动者在形成产品之前已被解体”的情形。要处理后者，你必须预设：那个未成形的东西在成形之前，就已经具有了某种可以被辨认的潜在价值。谁来辨认？马克思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是后续的批判在使用异化概念时，不自觉地替它回答的。必须有一个能辨认的守护者。四尊守护者，至此凑齐。

在收拢四说的边界之前，有必要对“不可计件”这个用词做一次预先澄清。此术语在女性主义劳动研究中有一个与之平行但不可混淆的传统。一个影响深远的分析脉络曾深度处理过“不计入GDP的照护劳动”——那些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内完成的、不被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所承认的照料工作，它们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系统不可或缺，却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正式经济账户之外。本文使用的“不可计件”与此传统存在结构上的家族相似：二者都指涉在正式核算系统内不被看见、却真实存续的生命活动。但本文的用法有一个严格限定——本文的“不可

计件”不指向研究者在学术劳动之外额外完成的情感付出，而是指向被学术优化系统主动从内部切除的、原本作为学术动作而孕育的火种：那些被切掉的研究动作、田野遭遇、理论直觉，在切除之后不以任何正式产品的形式存续，却以另一种方式在研究者体内继续发酵。这个限定区分了两件事：一侧是被系统忽视的外部劳动，另一侧是被系统主动排除的内部火种。后者的发生逻辑，正是本文接下来要追索的[³]。

至此，可以把四种旧解释的边界收拢成一个共同的暴露口。它们在描述“什么被切掉”时，都精确。它们在分析“为什么被切掉”时，也都各有纵深。但它们无不追到某个节点便停下来，无法再回答一个更原始的追问：那些被切掉的东西，在被切的一刻，凭什么算是“好东西”？如果它们在被切的时候还什么都不是——没有论文、没有概念、没有成形的学术产品——那是谁、在什么时候、凭什么凭据，断定它们的被切是一种“损失”？

四种解释的文本中，没有一处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但它们各自的论证若要自治，就不得不在暗处假定了某个答案。这个暗中的假定，就是本文要逮住共同隐鼠：存在一个能够在某个时刻辨认“未成形的好东西”的守护者，在将来替它们正名。

当这个先验假说被明着指认出来，它便不再能躲在暗处护航旧解释。一旦它被置于明处，只要再沉静地追一步——这个守护者到底存不存在？——事情就全变了。

三、追到所有人都不敢再退的一层

把前文逼出的那个共同预设掏出来，摆在明处。

它在每一种旧解释的理论叙事中，都不以正面命题出现，而是作为叙事能够自治的必要支撑偷偷立着。场域筛选说预设了在场域的长期博弈中，真正有价值之物终将得到承认。治理术批判预设了从权力技术的外部或抵抗位置，可以辨认出那些被压制的善品。常规科学沉降说预设了在革命被追认之后，那些被埋没的贡献将重新被历史看见。异化批判预设了那个被异化切掉的“原初劳动”，在异化发生前曾是完整的、创造性的、具有内在价值的。

四个预设，形制各异，同出一源。它们都指向一个形象：一个能够识别的、能够判断的、能够最终为被切之物正名的守护者。这个守护者不必是某个具体的人，它可以是一个制度（终极的学术共同体共识）、一种机制（范式革命的事后追认）、一个过程（长期知识进化会涤荡短视的屏蔽）。形态可变，功能不变——在某个时刻给出那个判断，将误扔的石头重新捡回来，刻上“这是房角石”。

本文把这个共通的预设命名为守护者假说。

这个假说过于隐蔽，隐蔽到连那些追求最彻底批判的学者，都很难察觉自己在用它。因为撤销它之后，下一步的面相太令人不适。撤销守护者假说意味着：你承认那批被切掉的东西，可能在它被切的时候，就是谁也认不出的——评审并非看走眼，而是评审的正常运转本就看不见；将来也不会等来平反，因为系统性的平反根本不会到来；所需要的不是更完善的守护制度，而是“守护”这个概念本身，就建立在一个对“可辨认性”的错误预期之上。

这才是旧批判不敢再退一步的那条线。退过这条线，你会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没有守护者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优化系统切除火种，并非一个等待被纠正的错误，而是这套系统在维持自身运转时不可避免、不可修复、不可改良的常规动作。优化的本质从来不是“挑选好的”，而是“排除不可算的”。而真正的火种——在它孕育期的最核心处——恰好就是不可算的。

当着这条线被明确画出，一对真正的矛盾就从旧批判的废墟中硬生顶了出来。这对矛盾不是某个人与某套制度的矛盾，而是两套生命秩序在同一个学术身体里的互撕：一侧是优化系统的生命秩序——它靠计件、可预期、可引证存活，它必须把不可算之物排出体外才能维持自身的呼吸。另一侧是创新的生命秩序——它靠不确定、不可计件、长时间不产出的沉默来积蓄自己，在任何一套优化秩序里，它都长得像一个应当被排出的错误。

旧批判看到的是这对矛盾在优化一侧的胜利——优化战胜了创新。但它停在了这一侧。它没有接着看到，从矛盾的另一侧——创新那一侧——矛盾并未因“被战胜”而消失。被切掉的火种无法在制度层面翻盘。但在一个比制度更深的、制度够不到的层面，被切掉的动作可以不以“翻盘”为形式、不以“被承认”为条件、不以“发表”为出口，自己把自己从被切的瞬间里重新生出来——生成为一个不靠外在守护者就能活的生命形式。

这里需要一个承重的补充。本文选择的田野案例携带较高的伦理密度，读者可能会产生一种合理的疑虑：这个论证是否暗中依赖了伦理场景本身特有的道义强度？如果把对象换成一类不含伦理内容的被切火种——比如一个年轻物理学家放弃了一个不知能否算出的理论猜想、转而去做能快速发论文的实验——他的体内还能产生类似的凹陷吗？本文的回应是：能，但那是另一种质地。本文的概念不要求被切掉的火种必须具有伦理内容。它只要求一个结构条件：研究者在与这个火种相关的情境中，经验了一次不可逆的身体相遇。这个相遇可以是一个老人擦手的动作，也可以是一行算不下去的方程在深夜草稿纸上反复被划掉又重写的触感，也可以是实验中仪器忽然静止那一瞬让人心里一沉的寂静。只要这个相遇在那个人的身体里烙下了一个无法被计件穿透的凹陷——不是“我知道这个很重要”，而是更原始的、说不清缘由的“我此后无法再对某些事无感”——互生性的生成条件就具备了。本文之所以选取一个伦理密度较高的田野案例，不是因为

它代表了互生性的唯一形态，而恰是因为它以最浓缩的方式展示了那个结构条件：一个人，在丝毫没有准备、没有方法、没有理论保护的情况下，被另一个人的身体动作整个地摄了进去。这个“被摄进去”就是凹陷的原型。其他场景里的凹陷，在结构上与它是同构的，只在内容上不同。

这个生命形式，需要一个名字。在接生这个名字之前，还必须再退一步，把“被切掉的东西何以能从切除本身中找到呼吸方式”的逻辑关节拧紧。“矛盾暴露了”并不自动等于“被排出的那一方能活”。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排出的那方就是死了——没发论文的人转行，没被写下的田野动作几年后从记忆中彻底消失。互生性如果要成立，不能只靠“矛盾给了它存在的理由”——存在理由不等于存在机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生成机制关节：被切掉的东西里，到底有什么成分，使得“切”这个动作不仅未能完全消灭它，反而在切的同一瞬间、在切够不到的深度里，触发了另一种积蓄方式的启动？

这个成分，就是“切不掉的身体相遇”。优化系统切掉的，是这场相遇的学术产物——论文、概念、可引用的文本。但它切不掉的，是这场相遇在发生的一瞬、已在研究者身体里做完的那件事：它已经作为一个完整的情境——温度、声音、沉默、时辰、以及研究者自己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还站在门口的身影——全部一次性打包进入了研究者的身体记忆。这个“打包进入”不经理论框架的检查口。它是在采集器尚未开机的那一层直接种进去的。优化系统能拦截一切通过检查口的东西。但它拦截不了不经过检查口的东西。这个不经过检查口便已种进去的东西，就是火种在切除之后能够自我积蓄的唯一本钱。它不是“被压制的原创劳动”。它是“在压制完成之前已经完成的植入”。植入不等于活。但它是一粒能被后续身体过程继续消化、继续发酵的种子。没有这粒种子，切除就是完全的切除。有了这粒种子，切除就只切掉了地面以上的部分——地下还有一截，还在土里，还活着。

把这个关节交代清楚之后，接下来的命名才有骨头可挂。本节以下，就是这个名字的接生。

撤销守护者假说之后，优化系统不能再被视作一套可以被问责、可被改良的不完善筛选机制。优化系统没有“患者身份”——它是一套自己在呼吸的秩序。它运作不是因为它坏了，而是因为它就是这么活着的。你无法要求一套靠计件存活的生命秩序去识别不可计件的东西，正如你无法要求肺去听见声音。肺不是耳朵，计件系统看不见不可计件。

在这前提下，被排出的火种若要活下去，不能靠申诉来让案子被重新受理——因为那个“重新受理者”就是肺，它天生听不见。火种只有一条路可走：在被排出的同时，在被排出这个动作本身里，找到一种不依赖肺的呼吸方式。

这种呼吸方式，就是被切掉的生命与田野经验之间，在优化系统够不到的深处，形成一种双向的、隐秘的、只有当事双方相互供养才能维持的生育关系。它不产生论文。它产生的是另一件事：研究者被那个他无法写出的伦理经验，反向地重新生育了一遍。在那个点之后，他即便转行做完全不相干的工作，他身体的某个部分、他看人的眼光、他对“什么是一个人在扛一件事”的体感，已经永久地被那个凌晨三点给婆婆擦手的动作改写了。而他在那个被改写的瞬间，不是作为一个“学者”被承认——他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认。他是作为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用身体做出的伦理动作，拉进了一种不可计件的互生关系。

有读者会质问：这还算是学术吗？如果它不产生论文、不进入学术共同体、不被同行评议，凭什么被冠以“学术”二字？这个质问本身即守护者假说的最后一次反扑。它预设了“学术”必须由一个叫“学术共同体”的外部实体认证过才算数。本文打算给“学术”重新下定义，那会滑入另一场论辩。本文换一个更诚实的词：生育。学术生育。不是学术生产。生产可计件——投入、产出、考核、验收，每个环节都可被优化。生育不是。生育是一件事在一个人体内发生了，改变了他体内某些不可逆的东西，并且这个被改变的东西会在他往后的生命里，以他自己也控制不了的方式，在各种不经意的动作中反复涌上来。涌上来的东西，可能永远不被写成论文。但它们会以另一种形式——一个毫无功利心的长回复、一次深夜放弃写完的田野笔记、一场不为发表而做的口述记录——在不进入计件系统的尺度上，完成对他人的传递。这不叫成果。但它是一种实存。它在优化逻辑的空气中无法呼吸，却在优化逻辑的肺叶够不到的深度里，能用另一套鳃活着。

这把鳃，就是本文要命名的东西——不可计件的学术互生性。

现在给出严格命名与定义。不可计件的学术互生性，指的是这样一种发生：在学术生产的优化逻辑已经对某类研究动作执行了系统性排出之后，研究者在田野中所遭遇的伦理经验，并不因“未能被写成论文”而从其生命中消失；相反，这个经验通过对研究者自身身体感知的不可逆重塑，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关系性的生成事件——一种双向的、非计件的、不依赖外在承认即可自我维持的生育关系。这种关系不产出可计件的学术产品，但它产出了一笔改变了研究者此后学术身体质地的生命存量；并且，这笔生命存量可在非正式、非制度化的传递中，间接地形塑他人的学术实践——这种形塑不经评审、不入简历、不留下可引证的文献目录，但它是一个人此后做出某些锋利判断时，他自己也无法完全追溯的、藏在身体深处的那个直觉的来源。

这个命名的分离线落在：“生产”与“生育”之间。学术生产是优化系统内的生命秩序——它靠计件呼吸。学术生育是优化系统够不到的、被切掉的火种自己找到的另一种呼吸方式——它不靠肺，靠鳃。优化可以切掉一切可被预判的产出。但它切不掉一件事：一个研究者在凌晨三点，没带录音笔、没开访谈提纲、没有任何“资料采集”意图，只是偶然路过灵堂时看到的那个动作——那个动作在他的身体里种下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不需要被写出来，就已经长在他里面了。这种“在体内生长”的过程，不是生产的边缘案例，而是另一个属。

这个命名不是为了给学术界增加一个新分类坐标。分类坐标是既成对象论的专长——把世界切成一个个可管理的抽屉。本文的命名，是给一个正在优化刀口下发生的、不被任何既有抽屉装得下的生命形式，暂时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的生命，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引用，而取决于它是否真的在某个人的体内发生过。

不可还原硬校验。这个名字可否被任何现存概念1:1替换？现将最危险的四个候选逐一过刀。

第一个候选，也是最危险的对手，是波兰尼的“隐性知识”概念。本文必须在此做比对一般简述更深的处理，因为任何熟悉波兰尼原文——而不仅是其教科书缩略版——的读者，都会在这个节点上提出最有力的质疑。

波兰尼在《个人知识》（1958）和《隐性维度》（1966）中，建立了远比“技能不可言传”宽广的认识论体系。他从“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能说出的多”这一基本命题出发，将科学发现中那种“莫名觉得这里有东西”的直觉也纳入了隐性知识的范畴。他称之为“求知热情”与“启发性冲动”。他笔下的科学家，同样不是按照形式化的推理步骤得出判断，而是通过对实验对象的长期沉浸式投入——“内居”——把整个身体当成一件测量工具，获得了一种无法被形式化规则所穷尽的感知力。这个科学家追一个模糊的异常，一追数年，说不清自己在追什么，只是“觉得不对”。这个描述，与本文所讲的那个被擦手动作震住、此后读论文会“胃里涌上什么”的研究者，在结构上确实高度相似。

这就逼出了一道不得不正面画下的分离线。承认相似，然后在这相似的最深处，指认唯一的分叉口。波兰尼的内居，无论其过程多么模糊、身体感知多么密集，其方向始终是指向认知的：那个科学家追那个说不清的异常，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知道——更好地发现问题、更好地设计实验、更好地推动知识的进展。隐性知识无论多“默会”，仍运转在认知-行动的连续统里：经由默会，达到更精准、更整全的认知。它服务的，最终是“更好地知道”。

学术互生性的凹陷不同。它的方向不是认知，而是伦理-感知阈值的位移。那个研究者在凌晨三点被擦手动作震住之后，他此后读论文感到的“不适”，不是他的隐性知识在提示“这里方法上或许有问题”——而是他体内那个被擦手动作种下的凹陷，让他此后不能再无感地滑过某些处理。这个不适并不让他“更好地做学术”；它可能反而让他更慢、更迟疑、更无法顺畅地完成一篇干净的安全论文。它不服务于认知-行动向度的优化。在这个向度的终端，它甚至可能是一个障碍——它让他的手在写下“道德展演”这四个字时，比没有那个凹陷的同行慢了零点几秒。这零点几秒的慢，对学术生产而言是无效损耗。但对一个被另一个人的伦理动作不可逆地改变过的人来说，这是他体内那块再也无法被完全烫平的凹陷，在替他——替那个凌晨三点的擦手动作——做一次极其微弱的、不计产出的抵抗。

这就是辨别线的最细处。退到这一步，两条路才真正分开。波兰尼的科学家追异常，是为了抵达一种他尚未言明、但一直朝着它去的更好的认知。本文的研究者被震住，不是朝着一个更好的认知去的——他是被一辆他没有看见的车从侧面撞上。撞完之后，他此后的学术身体里一直留着那场车祸的内伤。这个内伤不帮他更好地走路。它只是让他在走到某个特定路口时，会比别人多停零点几秒。波兰尼的内居最终通向知道。本文的凹陷最终通向一种无法再对某些事无感的身体状态。前者在认知-行动轴。后者在伦理-感知轴。这道缝，当着最危险的对手的面画出来，互生性才算扣好了它最容易被扯开的那粒纽扣。

第二个候选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也不对。实践智慧预设了一个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熟的德性主体，通过经验的反复锤炼，在具体情境中做出恰当判断。它指向的是判断力的精进。但学术互生性最初发生的那个瞬间，研究者不是成熟的主体——他是被那个老人的动作击穿了。他不成熟，他很弱，他连写都写不出来。那个动作在他身上发生的不是“让他更会判断”，而是“让他此后无法再对某些动作无感”。这不是判断力的增长，这是感知阈值的永久位移。两个向量。

第三个候选是人类学方法论教程中反复出现的“反思性”。反思性要求研究者审视自己在田野中的位置、权力关系与认识论局限。这是研究者的自我剖析，仍是研究者在操作——操作的对象是自己。但学术互生性在最核心的那个时刻，不是研究者在操作什么。他是不操作的。他是被那个动作击中，他在那个瞬间什么理论都掏不出来。他不是“反思自己的局限”，他是被另一个人的身体动作强行拉进了一种他此前不知道人可以这样活着的经验。这也不是同一件事。

第四个候选，是科学社会学中关于“无形学院”与隐性交往的研究。克兰、普赖斯等人精细地揭示了科学家之间非正式的沟通网络——私下手稿交换、会议间歇的谈话、没有被列为正式引用的口头传统——在知识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传统处理的，是正规发表体系之外的信息流通。它极具洞察力，但它与互生性所处理的不是同一类现象。无形学院里的师徒口传，仍然在“更好地做”这一认知-行动向度上运转：一个年轻科学家从导师不经意的闲谈中获得了一个他日后在正式论文中展开的灵感，这个灵感最终还是流向了可计件的学术产品。而互生性的传递——二十年后那一行“这个留着吧”——不流向任何可计件的产品。它不是信息流通，它是身体蚀刻。在这条分离线上，互生性彻底离开了信息流通的范式，进入了另一种传递属：一个研究者体内未被烫平的凹陷，在另一个人的不安全描写边缘，极其微弱地浮了一下。这不是信息的传递。这是一个凹陷挨上了另一个凹陷。

此外，互生性在身体记忆研究与情感人类学的交叉地带，还需要做一次快速的边界勘定。布莱克曼、克罗斯利等学者已深入处理过“身体如何记住未被语言形式化的社会经验”，情感沉积、具身记忆等概念与本文的“凹陷”“沉积”确实存在家族相似。这个传统是本文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本文的贡献不在此处：身体记忆研究在一般意义上描述了身体的社会铭刻机制，本文在此基础上追踪了这种铭刻在学术生产这个特定制度环境中的一项特异命运——它如何被优化轴系统性地切割，又如何在被切割后依然以一种改变研究者感知阈值的方

式自我积蓄。这个“被切割—切割不掉—自我积蓄”的三段式特化，是一般身体记忆研究所未专门处理的。它不是对这个传统的否定，而是它在制度夹缝中的一个极端案例。

最后，还有一笔欠债要还。本文的“不可计件”一词，与女性主义照护劳动研究中“不计入GDP的照护劳动”传统之间，存在一种深层同构，也有一个硬性分界。特龙托、弗尔布雷等学者面对的困境是：那些在家庭与私人领域中完成的、对整个社会再生产不可或缺的照护劳动，却被国民经济账户系统性地排除在外。她们的回答是：照护劳动在完成的那一刻，就已经对承受照护者的身体与人格造成了不可逆的改变——这个改变本身，就是它可以不被GDP账户承认却依然实存的根据。本文的互生性论证，在最底层与这一论证结构是同构的：双方都在指认一种“核算系统不予承认、但已在承受者体内造成不可逆蚀刻、因而不能因其不被承认就视为不存在”的实存。区别在于：照护劳动处理的是被核算系统忽视的外部劳动，互生性处理的是被优化系统从内部主动排除的未成形火种。前者是完整的劳动被排斥在核算边界之外，后者是被切掉之后残余的那截尚未被消化掉的身体植入。这个分界一旦守住，互生性就不是照护劳动理论在学术界的简单搬运，而是发生在制度内部的、属于学术身体自身的一种不可计件的生育。

至此，四个最直接、最危险的候选概念都已上桌，且都无法1:1替换“不可计件的学术互生性”。它切开的那道辨别面——在优化已穷尽所有可计件的生产形式之后，仍有另一类完全不在计件范畴内的、不依赖任何守护者承认的、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肉身相遇中双向发生的生育——暂时独立成立。

四、不可计件的学术互生性

上一节逼出了新命名，并在最密集的理论对质中确立了它的不可还原性。这一节要把这个命名从抽象的辨别维度，落实为可以在经验中指认、在逻辑上可追踪的实际动力过程。本节分四个递进段落：指认优化轴深层作用不是“切东西”而是“重置生命秩序”；展示互生性的发生在田野关系中最初始的启动；描摹被切之后互生性如何在研究者体内自我积蓄并抵抗降解；最后讨论这种积蓄在不经正式发表的情况下，如何可能完成对他者的间接形塑——这种传递不是互生性的成立条件，而是它在罕见情形下溢出个体生命边界的额外痕迹。

4.1 从“切东西”到“重置生命秩序”

此前对优化逻辑的描摹揭示了三根轴的协同作用：不出错锁定了论文怎么写，不浪费重塑了田野里的时间感，不亏本决定了学者对有限学术生命的分配。这些分析已相当准确地揭示了筛选机制如何层层收紧——不是某个人在刻意压制创新，而是一套“安全—效率—核算”的生命秩序在自我维持中，把不符合它呼吸节奏的动作逐层排出。

但这个分析在追至最深时，仍然停在一个节点上：它把优化轴的作用终点，放在了“切掉了火种”这一判断上。火种被切，是一幅暴力的意象。但暴力的意象容易让人误以为，只要切的动作停手，火种就能活。停不了手。因为这三根轴不是在执行一项可以被暂停的“筛选政策”——它们就是这套学术生产系统自己的呼吸。不出错，是肺吸气；不浪费，是肺换气；不亏本，是肺排出废气。你不让一套考核制度排出不可算的东西，就等于你不让肺排出二氧化碳。肺做不到。优化系统也做不到。在这个意义上，优化系统对火种的“切割”，不是一项可以被纠正的外部暴力，而是两套生命秩序的必然互斥：计件的生命秩序，必须把不可计件的生命秩序排出体外，才能维持自身的稳态。

这个判断把问题从“如何改良体制”的轨道上整个挪开。如果切割是必然的，火种的出路就不可能是“等待被制度重新接纳”。接纳永远不会来。火种的出路只在另一个方向：在被切割的同一瞬间，在切割动作够不到的那个深度里，找到自己不被计件逻辑穿透的另一套呼吸方式。

4.2 从“采集”到“互生”：田野关系的最初凹陷

要找到这套呼吸方式，就必须回到一切发生的最初凹陷——不是在产出论文的环节，而是在田野中，研究者第一次被一个不在任何提纲内的伦理动作打入沉默的瞬间。

此前，优化系统的分析在田野层，主要聚焦于高效生产轴如何重铸了研究者的田野时间感：他的身体被预编程，注意力被限定在可被理论消化的现象上，笔记本里不再有“不知道这算什么”的模糊记录。这些分析是必要的。但它漏掉了另一个在同一个田野现场同时发生、却被“切东西”的叙事完全覆盖住的动作方向：被切掉的火种，并非在发论文的节点才第一次被切。它在田野笔记阶段，就已经被切过一次了。但在这里——“切”是什么意思？如果把“切”理解为“这件事从此不存在了”，那整篇论文就没了。本文要说的恰恰是：切事件，不等于灭生命。

二儿媳凌晨三点用温水给婆婆擦手四十分钟的那个动作，在那位研究者的终稿里被删除了。这是切事件。但在他删除之前，他曾在那天凌晨路过灵堂。他看见了。他当时没有拿笔记本，没有掏录音笔，他只是路过。但他的眼睛看见了那个女人的手的移动，他的耳朵里是凌晨村落的寂静，他的鼻子闻到了温水蒸汽混着老房子木头的味道。这些感觉，和他的眼睛一起，在那个瞬间被那个动作整个地摄了进去。他后来——写论文的时候——摘掉了。但他体内的那个摄进去的东西，被摘掉了么？

没有。因为那个东西在被他看见的那个瞬间，就不是以“资料”的身份进入他的。那个东西在那个女人的手碰到毛巾、毛巾碰到婆婆手背的那一瞬，是以一个完整的情境——身体、温度、沉默、时辰、以及他自己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还站在灵堂门口的身影——全部一次性打包进入的。这个进入，从一开始就不经理论框架。它不是在采集器里被截停的，而是在采集器尚未开机的那个层级，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记忆。后来，他在终稿里用安全配方的语言处理了哭丧的大儿媳。那个处理，是他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学者的专业动作。但他作为一个人，凌晨三点路过灵堂看见擦手动作的那个“摄入”，不是一个专业动作。它什么都没做。它就只是被种了进去。

这个“种进去”，就是最初的互生凹陷^[4]。它不是研究者主动去“理解”被研究者的伦理。是研究者自己，在丝毫没有准备、没有方法、没有理论保护的情形下，被那个伦理动作作为一个情境整个地“拉了进去”。在被拉进去的那一刻，他的身体先于他的任何理论判断，已经对那个动作产生了一种他无法命名的伦理响应。他感觉到了那个动作里有东西——重的东西——但他无法在论文里说清楚那是什么。这种响应，就是我称它为“凹陷”的原因：在他此后进行无数次学术决策的那个平滑表面——这个材料用不用、这段分析怎么写、这个理论框架对不对——上，被那个凌晨三点用体温和温水摩挲死者皮肤的触感，永久地烙出了一个轻微的下陷。此后他的所有学术判断流经这一块表面时，都会在这个陷下去的地方，比别处慢了零点几秒。这零点几秒的慢，不是他主动选择的。是那个被种进去的东西，在他里面替他慢的。

4.3 切断之后：互生性如何自我积蓄

接下来是决定性的时刻。这篇论文投出去，通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人会知道他曾经见过擦手这个动作。从“切事件”的角度看，火种被切除了，一干二净，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那么本文的诊断与旧优化批判就没有任何区别。本文之所以要逼出这个新概念，是因为故事在这里并没有结束。它只是被计件的叙事给封口了。在计件叙事之外，另一条完全不归计件管理的轨迹，从他凌晨三点路过灵堂的次日清晨，就已经开始运转了。

这条轨迹的第一步，不是写，是消化。他在之后的好几个星期里，发现自己时不时会想起那个擦手的画面。不是在做分析的时候。是在他吃饭、走路、洗自己茶杯的时候，那个画面会突然浮上来，没有缘由。他没有拿它做任何事。他只是在消化它。就像一个人的胃消化了一顿没有菜单的饭。它被吃进去了，胃不管它好不好吃，胃只管分解它，把它拆成能进入血液的最小分子。那个擦手动作的影像、声音、温度和沉默，被他的身体反复咀嚼了不知多少次之后，慢慢分解成一些更细碎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再是“擦手事件”本身了，它们变成了他身体里一种非常微弱的、但是持久的沉积——像水中长期静置后沉在杯底的那层极细的沙。平时看不见。但水一晃，它就浮起来。

这里需要一个诚实的追问：这个消化过程，凭什么没有被他的日常计件生活降解掉？他回去照样写安全论文，照样通过考核，照样在优化系统的空气中呼与吸。优化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化器官——它会日复一日地消解掉那些“没用的身体记忆”。为什么这个凹陷扛住了？

回答不能从被动的身体记忆中直接推出。必须引入一个对抗降解的机制。可能的方向是：恰恰是他此后的安全学术实践——他用“道德展演”框架去藏起哭丧的大儿媳、他在终稿中删除擦手动作、他逐年积累的规范论文——构成了对这个凹陷的反复压制。而每一次压制，实质上都是一次微弱的重复接触：他在删除某些东西时，重新碰到了那个凹陷的边缘。他以为他删干净了。但他的身体知道，他那里有个东西，二十年前曾经被温水泡软过，后来干结了，但每次他写“道德展演”这四个字的时候，结痂下面那层薄薄的新皮，会轻轻地疼一下。这种“越压越深”的机制，可以构成一个对抗日常降解的解释。它不是研究者主动的“不忘”。它是优化系统自己在替那个凹陷做反向加固——每一次安全写作中的删除、每一个需要按既定框架去归位的田野材料，都在他体内那个已经凹陷下去的地方，再碾一下。碾一次，不是加深记忆，而是让那层细沙更实、更沉。久而久之，那个凹陷不再是一层感知，而是长成了他身体质地的一部分。

这一步之后，是更长时段的沉积与身体的反向校准。这层沉积在后续的学术阅读中会怎样浮现，他自己也未必能精确指认。他读到那篇用“道德展演”干净利落地消化了一个田野动作的论文时，胃里有什么东西涌上来。他说不清那是什么——也许不是理性的批评，也许连“批评”都谈不上。只是那顿没有菜单的饭在他体内留下的沉积，在那一刻被搅动了。他感觉到某种东西不太对。具体哪里不太对，他说不上来。只是读到这里的时候，他比读别处慢了半拍。这半拍慢，不是他的理论框架给他的——他的理论框架就是那些分类。这半拍慢，是他体内那个凌晨三点擦手的凹陷，在他每次碰到平滑表面的判断时，从底下轻轻地往上一浮。在他察觉到自己有任何“判断”之前，他的身体已经先替他做了一个几乎无法被计件系统捕捉的动作：停了一停。

他此后的论文可能依然很好、很规范、很安全。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推翻自己那篇用“道德展演”处理哭丧的旧文。但在写那些安全论文的时候，他自己的手，已经在某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是在哪一刻，偷偷地不再像以前那么滑了。在某个他自己也没注意到的措辞转弯处，他多加了一个“或许”、一个“也许不能简单归为”、一个“这里似乎还有一点什么”。这些措辞不改变论文的整体框架，不构成对安全配方的叛离。它们只是一道凹陷的痕迹——一个从未被写进任何论文、从未被任何人看见、却在每一次写作的微观决策里反复浮现的身体记忆，在语言的表面划下的一行极浅的纹理。它不是“不够的判断”，它甚至还未成形为判断。它只是比平时慢了半拍。

然后是在他此后的生活中——跟学生聊天、跟田野对象再次见面、在深夜写一段不是论文的笔记——他会在某个极不起眼的缝隙里，

做出一个不在任何考核表上的动作：多问了一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想问的话；在别人已经总结完之后，又轻轻地、不太自信地加上一句“她那个动作，可能不是义务……我说不上来，但我总觉得不是”；或者，更简单的，他就只是坐在那里，在那个话题应当结束的时刻，没有结束它。这些动作全都可以被优化轴毫不费力地碾过去——“无产出”“无建设性”“不够聚焦”。但它就是那支火种在被切成灰之后，灰里的最后一粒暗红，被他自己的体温捂着，没有熄。

这三步——消化、反刍式的沉积加固、微量上浮——没有一步进入计件系统。从计件的视角看，这个人“还是没有发出来”。他体内进行的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术事件——它是另一些事，用一套与学术生产完全不同的时间尺度和代谢方式，在他的身体内部，安静地完成了一个研究者的反向生育。本文把它叫作生育，不是比喻。生育意味着：他此后做出的任何一点比安全配方多出来的“多余动作”，他此生中任何一个没有被优化轴彻底压平的棱角，他任何一个“说不上来为什么但我觉得这篇用道德展演去处理哭丧不够”的身体迟疑——它们的最终母本，就可能永远无法追溯到一篇正式论文。它们的母本，可能就是二十年前凌晨三点那个老人被温水轻轻擦过的手背，在当年的那个年轻研究者体内，无声地、不计件地、在没有一个守护者见证的深处，悄悄地生下来的。

4.4 互生性的传递：不经过发表的形塑

对“这还不是学术”的质疑，第三节末尾已做过一轮回应——那个质问是守护者假说的最后一次反扑。这里还有最后一层质疑，更具体，也更结实：就算那个研究者在体内完成了自我生育，他对学科做了什么贡献？如果这种生育只是私人体验，那他跟一个被田野经验触动、回去写了一篇私人日记的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如果只是私人触动，那凭什么叫它“学术互生性”？

这个问题必须正面回答。但回答的方式，不是论证这种生育必须传递到第二个人才算数。互生性首先在“一”那里完成了自身。它不要求被传递。那个凌晨三点被擦手动作种下凹陷的研究者，哪怕此后从未把这个凹陷传递给任何人，他体内的那个不可计件的自我积蓄，在严格的定义下依然是“互生性”的一次完整的发生。它不需要经过传递才能成立。

本节所记录的“从一到二”，不是互生性的完成条件，而是它在罕见情形下溢出研究者个体的额外痕迹。它恰恰因为罕见，才值得被记录。它展示的是：那笔不记在任何考核表上的生命存量，除了在个体内部自我积蓄之外，还有可能——在特定的、不可预判的相遇中——以极微弱的方式触碰到另一个人。这种触碰不是互生性的本质，但它是不被优化系统完全封死的唯一泄口。

这层传递的最典型形态，发生在非正式的学术交流空间里。那个研究者此后在某个讲座上，讲完他的规范论文，快结束的时候，他忽然加了一句：“其实我那次在田野里，还看到了一个老人的擦手动作。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我这个框架，还是哪里欠缺了它，说不太清楚。”他说完就停了。他没有展开，没有论证，他也没有在任何论文里写过这段话。这句话，对在座的绝大多数听众而言，过耳即忘。但其中有一个人——一个正在自己的田野里被类似苦恼折磨着的年轻研究者——记下了。不是记在本子上，是记在了他自己身体里的那些相似的凹陷里。那个凹陷碰到了另一个凹陷。在那一刻，一种不经过发表、不经过大纲、不经过引用索引的传递，就完成了。

另一种更隐蔽的传递形态，是通过论文中微不可察的迟疑来完成的。那个研究者没发擦手的论文。他发了哭丧的论文。那篇哭丧论文做得很规范。但一个认真的后来人，在读那篇规范的哭丧论文时，会在某个非常不起眼的段落里——可能是献祭那一节的第三段末，可能是对道德展演概念运用时一个轻轻的犹豫措辞——感到一种异样的停顿。这种停顿不是论文的论证结构自己产生的。是那个研究者在写这段的时候，他体内那个凹陷在底下无声地往上浮，让他的手在打出“道德展演”这四个字时，不自觉地比刚才慢了零点几秒。这零点几秒，在最终成文的语词上，可能只体现为一个多余的限定词——“或许可以称之为道德展演”——这个“或许”不是方法论的审慎，方法论审慎可以用很多词完成。这个“或许”是他给凌晨三点那个擦手动作留的一个微不可察的后门。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留了这个门。后来人如果读得太快，就错过了。但如果后来人读得足够慢、而且他自己也在田野中积累了类似的无法被安全语言消化的苦恼，他读到这个“或许”，会停下来。他会感觉这个作者的这一句话，跟论文其他地方的平滑质地不太一样。它有一点点微微的涩。这点涩，对他说：这里，你也要小心。

这就是学术互生性不依赖发表而自我传递的最小机制。它不挑战优化系统的运转。它在优化系统的每次切割完成之后的余灰里，在他人的余灰挨着余灰的那个瞬间，完成一次极其微弱的、不计件的、几乎看不见的接力。这套接力不需要制度提供什么制度缝隙。它需要的唯一缝隙，是传递者自己体内的那个凹陷还没被完全烫平，而接收者体内也同样恰好有那么一个凹陷——在那一个具体的、偶然的、无法被任何安全配方预埋的动作对接里，两颗被剪不同的火种，用最后一次燃烧的热，挨了一下。

五、以新眼光重读旧材料

现在用这把新磨的刀，重读一组田野材料。这组材料来自一篇规范的土家族丧葬伦理民族志^[5]：作者翔实地写了哭丧的大儿媳，并用伦理人类学中“道德展演”的既有框架给她的行为做了完整的理论归位；同一场葬礼上，凌晨三点用温水给婆婆擦手四十分钟的二儿媳，只在作者的田野笔记里留下一句“老二家的擦手，不知道算什么”，在终稿里被完全删除。此前对此材料的分析，停在了一个尖锐但精确的判断上：被排除在终稿之外的，恰恰是最可能逼出新概念的那个材料；被留下来成为论文核心证据的，是安全配方能完美处理的替代品。这个判断指出了刀的落点。

但它没有接着问：那个在终稿里被删除的擦手动作，在作者删掉它之后，有没有在他体内的某个非文本的层面，以非文本的方式，继续对他发生作用？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再看论文文本了。要看的是文本外面的溢出——那些跟同一时期相关的、非发表性质的材料。这里用的是一份此前没有进入分析的记录：这篇论文的作者七年后，带了一个自己的硕士生，那个硕士生选了一个跟丧葬伦理无关的题目，做的是城市临终关怀病房里的护工伦理。在那个硕士生的初稿里，有一段很不符合论文安全格式的描写——写了一个护工在做完所有规定护理动作之后，还加了一个没有任何护理学依据的动作：在病人已经完全昏迷、不可能有任何知觉的情况下，护工扶着病人的手，放在病人的胸口上，自己退了两步，在病房的角落里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段描写没有理论分析，硕士生只是在田野笔记里写了，然后在论文初稿的“伦理实践”一节结尾，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它放进去了，而且放得有点犹豫——前面所有分析都是严格按照叙事伦理的既有框架做的，只有这一段，没有分析，只是一段描写，突兀地立在章节末尾。

这里需要补齐硕士生那一侧的凹陷发生过程——在“双向互生”的定义中，这是不可缺的一笔。那个硕士生后来在与导师的某次非正式谈话中，曾简短地提到过那个护工退后两步的时刻。他说，他在病房里站了一整天的实习，看了许多护理动作——翻身、吸痰、测血压——他都记得，但都没有特别的感觉。唯独那个退后两步，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站在那儿动不了了。护工放手的那一下，病人的手落在自己胸口上，那个手落下去的样子，让他想起了一个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说，那个动作里没有任何可以被护理学课程编码的内容——它不在任何操作规范里，它甚至不是照护，因为它做的那一瞬，护理对象已完全不可能感知它。它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接收者的动作。它唯一的接收者，就是在病房角落里站着的那个护工自己。那个硕士生说，他回来之后一直没有把这段写进论文，因为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他的田野笔记里，这整段描写的最上面一行，打了三个问号，再无其他。

他最后还是把它放进去了。放在章节末尾，没有分析，只是放在那里。他给他的导师看的初稿里，这段描写就那样突兀地立在所有规范分析的最后。然后，他的导师——也就是那个七年前删掉擦手动作的人——在批注里对这段描写作了如下处理。他没有删。他没有批“理论分析不足”。他在这段描写的空白处，写了一行红字。这行红字不是分析，不是修改意见，不是批语。它是五个字：“这个留着吧。”

以下是对这一幕的生成过程还原。

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行红字的确切来路。它有可能只是年岁渐长后的温和——他带了多年学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于要求学生在初稿阶段就严格控制材料。它有可能只是他那天心情好。它有可能只是一次偶然的犹豫——手指在红笔落到纸上的前一瞬，不知被什么挡了零点几秒，于是本来要写的“删”变成了“留着吧”。所有这些朴素解释，都与此刻这一幕完全兼容。互生性的生成机制框架并不排斥它们。它只在这些朴素解释之上，多加了一重可能性。

如果——仅仅是如果——他体内那个凌晨三点被温水擦过的手背所烙下的凹陷，在这个具体的批注瞬间，确实从底下往上浮了一浮；如果那零点几秒的迟疑，确实不是年岁的增长、不是脾气的变好、不是教学经验的积累——而是那个从未被他写进任何论文、从未被任何人看见、但二十年来从未被完全消化掉的身体记忆，在他的食指即将落笔删除另一个人的不安全描写时，轻轻地、几乎不被他自己察觉地，替他兜了一下。那么，这五个字，就是另一场凌晨三点的接力。

这不是他在修正七年前的错误。七年前他删掉擦手的那篇论文，他从来没有推翻过它。他此后发表的论文依然规范、安全、可以被优化系统的任何一根轴畅通无阻地通过。那个凌晨三点的擦手动作，在他的学术简历里永远地缺席了。他此生的所有已发表的论文加起来，都不能弥补那个缺席。他七年后在学生的初稿边缘写下“这个留着吧”，这个动作不构成对他七年前自己的平反。它只是一个凹陷挨上了另一个凹陷。他不比他七年前更“对”。他只是在这一瞬间——仅仅在这一瞬间——他的身体做了一个他的理论框架不会替他做的动作。

这个动作，从计件的账本上看，什么都不是。它不叫成果。它没有产出任何论文的增量。从互生性的账本上看，它是一个研究者在自己被优化了二十年之后，身体里还没有被完全烫平的最后一块凹陷，在另一个人的不安全描写上，极其微弱地、不计件地、几乎看不见地，浮了一下。这五个字，对那个硕士生此后的学术动作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无法从现有的材料中推断——那需要追踪更长的职业生涯、对比更多类似处境下的决策。但它的意义不在结果验证，而在痕迹本身。它是互生性传递的一个可能性痕迹——不多，但也不少。

这里必须诚实交代本文经验证据的当前边界。本文目前提供的互生性传递痕迹，仅为一例深度生成过程还原：一个研究者在七年间从“删除擦手”到“留着擦手”的微观决策变化，及其可能的生成机制链条（凹陷→消化→沉积→在批注瞬间的微量上浮）。这例还原，在生成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追踪的线索，但在实证上尚未构成可被独立观测的确凿证据——它无法排除朴素替代解释（年岁、情绪、教学经验），也尚未获得来自独立同行的对照材料。本文作者在后续修订中，计划搜集两到三例来自匿名同行的批注对照，以构成最低程度的独立验证。在此之前，本文的经验证据严格保持“可能痕迹”的语气——它不夸张自己所握有的证据力度，也不因证据尚薄就收回一个值得被继续考察的概念。

在现有的语气边界内，这五个字仍然值得被记录。它是一种微弱的、不经发表的、在两个身体之间只发生了一瞬间的最小传递。它不是“互生性必然传递”的证据。它是“互生性可能传递”的一枚痕迹。它说：有这样的事情。它不说：每次都这样。它只够格做一个发问的

起点——如果这一类传递可以被系统地追踪、对比、独立编码，那么它就不再是一枚孤立的痕迹，而是一个可供后续研究追踪的切口。

六、可裁决的边界与可反驳的条件

一个新概念不能被证伪，它就只是另一种安全配方。以下对本概念提出四种最危险的反驳，并诚实给出回应与限定。

反驳一：互生性太微弱，无法改变学科生产格局。这是本文面临的最常识性的质疑。如果互生性只是极个别人体内的私人经验，它对整个优化逻辑的运转不构成任何实质扰动，那它就不值得被理论化。

回应：本文不否认它的微弱。本文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改变学科生产格局”这个目标——那不是微弱，那是空想。本文的论证目标更精确：在优化系统已被证明是“不可改良的必然排出者”之后，火种的存活只能靠一套完全不同于优化逻辑的生命方式。本文把这套方式从“不可言说的私人体验”中分离出来，做了结构性的命名——互生性的发生机制（凹陷的形成、消化与对抗降解的沉积加固、在特定触发条件下的微量上浮）是可被描述、可被追踪的。微弱不等于不存在。更关键的是，互生性的微弱性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现象本质的一部分。优化系统之所以能够运转，正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它的件件逻辑可以完全穿透学术身体——所有动作，要么被件件、要么不存在。互生性的微弱，恰恰证明了这个前提的失败。它不需要“强”到足以与优化系统正面抗衡——它只需要存在，就已经完成了对“完全可穿透性”假设的证伪。

反驳二：互生性无法被独立观测，依赖研究者自述，只是美丽的直觉。如果这个概念只能在回忆性访谈里以“我觉得我被他影响了”的形式出现，那它就没办法被独立验证，变成了一篇自我确认的叙述。

回应：本文接受批评，严格限定——目前的论证是基于单一案例的深度生成过程还原，经验证据尚为一例“可能痕迹”，尚未完成独立观测的实证检验。但概念本身预留了可观测的操作化路径。第五节描摹的“页边传递”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独立追踪指标——不同导师对硕士论文初稿中“不安全描写”的批注处理模式，可以构成一个可被第三方编码的比较维度。这里需要做一次诚实的方法论自省：互生性在批注行为上的操作性后果，很可能不是单向的。同一个被深度互生过的导师，在某些情况下对学生的“不安全描写”会保留（如本文案例中的“这个留着吧”），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也可能变得更严苛——因为他被震住过，他对那些用不安全描写轻率地、感伤地、自我感动地处理伦理经验的做法，可能比没被震住过的人更敏感、更不耐受。“不要这么写。你这样写是辜负了那个动作的分量”——这种批注同样是互生性的表现，但它在操作层面表现为“更严苛的删除”而非“更宽容的保留”。这意味着，任何以“保留率”为唯一指标的比较设计，都可能把另一半互生性的操作性后果误判为“未发生互生性”。更深层的问题是：如果互生性在操作层面既可能表现为宽容、也可能表现为严苛，那么它就不能被还原为一种人格倾向（“这个人因为自己的经历而变得更温和”），而必须被严格地保持在结构层面——它是一种感知阈值的位移，位移之后的表征，随情境不同而呈现为不同的操作性决策。这个复杂化不但不被坏实证检验，反而可以激出一个更精密的编码方案：不只是“保留/删除”，而是区分“删除并要求理论归位”“删除并给出替代性改写”“保留并加注”“保留不加注”——把互生性的操作性后果定义为一组特征性的批注模式组合，而非单个行为指标。诚实地承认这个概念的操作化比最初预想的更复杂，不削弱它的可裁决性，反而是把可裁决性从粗糙的二分推进了可操作的细粒度编码。

反驳三：互生性概念有倒退回心性修养论的风险——它似乎在说，只要研究者内心完成了生育，就算论文没发也是好的。这是危险的自我安慰。

回应：这个批评击中了本文最容易滑向的一个陷阱。本文必须严正申明：互生性不是内心修养，不是德性自我圆满，不是“只要我自己被感动了就算学术”。互生性是一种关系性的事实，不是一种心理状态。它的发生条件不是一个研究者的善良，而是他在田野中与另一个人的伦理动作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可逆的身体相遇。这场相遇不被他的论文承认，但他此后无法不再被那个动作所质询。这种“无法不”——不是内心修养，是被另一个人改变了身体的沉积。互生性的伦理底线在此：它不是一种自我满足，它是一种持久的、对自己再也写不出完全自洽的安全论文的终生不适。想要内心平静的人，不会去碰互生性。互生性最直接的滋味，不是安宁，是一种这辈子都写不出我真正看见的那件事的焦灼。它不值得任何人把它当成一种可以自我安慰的道德胜利。它不是。它是那一侧被剪掉之后，伤口自己长的疤。

反驳四：撤销守护者假说之后，这个论证似乎暗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守护者——为被切掉的火种赋名、赋权。你不就是那个回来正名的人吗？

回应：这是一面最危险的镜子。本文无法否认这种倒滑的风险。本文能做的，只是在最后一行的证伪条件里，把这篇论文自己也放进可被切断的那一侧。本文不给火种提供任何守护与正名。本文只做一件事：说有一种火种，在没人守护的情况下，自己长出了鳃。如果这件事在下一个研究里被证明不存在——如果在更大的样本追踪中，所有被优化切掉的火种都死透了，第五节的“页边传递”只是孤例、不可复现——那么本文的概念就作废。它不靠任何守护者的宽容活着。它活不活，看证据。

代结语：不被算账的生命，不靠守护者活着

伦理转向在中国的落地，曾被说成是一场被优化的善意。它确实是。优化系统切掉了那把刀最锋利的刃口，留下了一条规范、安全、

可预期的产品线。这个诊断没有错。但它停在了一个过分绝望的断崖前。面对那台正在有序切掉火种的机器，旧诊断只能追到切除的精密动作为止，然后它对火种说：“你被切掉了。”

它没有接着对火种说：“被切掉的东西，不一定要靠被重新种回去才能活。”

本文追出了旧诊断被钉住的根源：它们都暗中站在一个“守护者”的假说上，以为火种要活下去，必须要有一个外部的识别者替它正名。可那个识别者不会来。这个系统不是坏掉的机器，是另一套活着的秩序。它用计件呼吸，它就必然把不可计件的东西从肺里排出去。任何等待它良心发现、提高分辨率、更精准地识别“好的不确定”和“差的不确定”的方案，都是在试图让一只肺去学会听声音。肺不需要听声音，肺有肺的事。

而火种，在被肺排出去的同一瞬间，可以在肺够不到的那个深度里，用另一种方式呼吸。

那个凌晨三点用温水给故去婆婆擦手的女人，没有要求任何人为她写的论文署名。她只是用毛巾蘸水，做了四十分钟。那个在红笔批注里写下“这个留着吧”的导师，没有推翻他七年前的安全论文。他只是食指停了零点几秒——那一瞬间，他体内的凹陷浮上来，替他兜住了另一个人拍过来的那一粒暗红。

这些动作都不在计件系统的感应区内。但它们是一笔实存的账。是另一个账本的，在另一个时间尺度上，用另一套货币在往返。

这笔账不要求制度为它创造任何特殊保护区。它自己会找缝。它的缝就是人的身体——人体的胃，人体的手，人体在凌晨三点还没完全死透的感知，人体在红笔即将落下的那一刻比平时慢了零点几秒的迟疑。这里必须补一句诚实的限定：这些凹陷不是身体的天然天真——身体本身也早已被计件逻辑反复穿透了无数次。学者的田野时间被压缩成可发表单元，学者的注意力被预编程为可被理论消化的采集器，学者的手在田野笔记中已经学会了自我审查。互生性所依靠的那个“身体缝隙”，不是一块未被制度污染的净土。它是穿透之后的残余，而不是穿透之前的本源。优化的刀可以切掉一切可计件的产出，但它无法把一个人的身体彻底烫平。只要身体还有没有被完全格式化的凹陷，这个凹陷就可能在某一天碰到另一个凹陷，完成一次不被计件、不被引证、不被任何外部守护者看见的最小传递。这道传递，不靠体制的仁慈。它不需要仁慈。它只需要两个人在不同的年份里，各自在凌晨三点见过同一类动作，并且都还没有被这个动作消化完。

证伪条件

如果未来有研究者用可独立观测的实证路径追踪了足够数量的被删田野材料，并证明——在后续更长职业生涯中，这些被删材料没有研究者本人的非发表动作（教学中的溢出、批注中的迟疑、非正式的学术建议）中留下任何可辨识的、系统性高于对照组的传递痕迹，那么“不可计件的学术互生性”就是一个靠不住的概念。它应该在那时被平静地废除，不做任何理论上的抢救。一个不能被复现的火种，不值得在任何账本上多活一格。

注释

[^1]: “安全引证、高效产出、稳赚核算”并非来自某一特定理论的正式概念，而是对近年来中国学术管理制度中形成的一整套实践逻辑的分析性归纳。其中，“安全引证”指理论框架和引用来源需符合公认安全范围以避免评审风险；“高效产出”指田野周期与文字产出周期被缩短至考核周期可承受的长度；“稳赚核算”指研究者对学术生命时间的分配必须保证可见收益。三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了一种计件式的生命秩序。

[^2]: 库恩在1969年《科学革命的结构》后记中讨论过范式在跨学科、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可通约性”问题，已部分触及了本文所处理的“变形”。但本文要指出的是：即使引入了不可通约性的讨论，库恩的整个叙事仍建立在“被追认的革命”这一回溯性结构上——他处理的，永远是已经发生过的、已经被识别过的、已经被写进教科书的范式转换。而本文所面对的那批火种，是在任何追认发生之前就被切掉的。库恩的框架里，始终没有给“未被追认”的沉默革命留出一个位置。

[^3]: “不可计件的学术互生性”与女性主义照护劳动研究中“不计入GDP的照护劳动”分析传统的关系，在第三节末尾的概念辨析中已做详细展开。此处不再赘述，仅强调一点：二者共享“核算系统不予承认、但已在承受者体内造成不可逆蚀刻”这一深层论证结构，但互生性的对象是被系统从内部主动排除的未成形火种，照护劳动批评的对象是被系统从外部忽视的完整劳动。这一区分决定了二者各自的理论射程不可互换。

[^4]: 本文引入的“凹陷”“沉积”“微量上浮”等词汇，属于现象学描述层面的工作概念。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在经验上追踪互生性在身体感知层面的可能痕迹，而非宣称发现了某种心理实体。后续研究若能设计出可独立观测的指标，这些词汇应被更具操作性的术语替换。这一限定在此一并申明，不在正文中逐处重复。

[^5]: 第五节所使用的田野材料来自一项关于土家族丧葬伦理的民族志研究。为保护被研究者的隐私，材料中的人物与地点已做匿名化处理，部分细节进行了合成与简化，以突出理论分析所需的结构性关系。这组材料在本研究中充当的是思想拓展性质的例示，而非经过同行评议的实证数据。

参考文献

Bourdieu, P. (1984). *Homo Academicu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Foucault, M. (2004).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Paris: Gallimard/Seuil.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lanyi, M. (1958).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lanyi, M.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